

亿万富翁 的舞会

超级富豪如何绑架了世界。

The Trouble with Billionaires



看亿万富翁如何

绑架了经济、俘虏了政府

摧毁了大多数人想拥有美好生活的梦想

[加] 琳达·麦奎格 (Linda McQuaig) [加] 尼尔·布鲁克斯 (Neil Brooks) 著

倪云松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亿万富翁 的舞会

超级富豪如何绑架了世界

The Trouble with Billionaires

[加] 琳达·麦奎格 (Linda McQuaig) [加] 尼尔·布鲁克斯 (Neil Brooks) 著

倪云松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亿万富翁的舞会：超级富豪如何绑架了世界 / (加) 麦奎格, (加) 布鲁克斯 著; 倪云松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8

书名原文: The trouble with billionaires

ISBN 978-7-5060-6673-0

I. ①亿… II. ①麦… ②布… ③倪… III. ①经济—研究—美国 IV. ①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677 号

Copyright © Linda McQuaig and Neil Brooks, 2012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Linda McQuaig and Neil Brooks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5084 号

亿万富翁的舞会：超级富豪如何绑架了世界

(YIWANFUWENG DE WUHUI: CHAOJIFUHAO RUHE BANGJIALE SHIJIE)

作 者: [加] 琳达·麦奎格 [加] 尼尔·布鲁克斯

译 者: 倪云松

责任编辑: 徐 玲 贾 佳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673-0

定 价: 4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第1章 重返财阀统治 001

在20世纪初期，美国式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由几十个“强盗大亨”主宰的社会。随着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及其后痛苦的经济衰退，美国的富豪统治走入低谷。在战后干预的年代（1950—1980年期间），通过对富豪征收高额税收的方式，美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的收入分配，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广大的国民分享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的复兴使美国恢复到由富豪统治的国家，人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乃至零增长时期，工会力量凋敝，不平等问题严重。直到在2011年的秋天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才又大胆地把民主以及平等的主题重新推回到聚光灯下。

第2章 为什么色情业是唯一真正的自由市场 023

有钱人通常认为他们是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获得巨大的财富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依靠一套复杂的法律实现了对巨额财富的占有。所谓的简单的、自然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市场就是一个政府干预的复杂网络。版权法允许艺术家和表演者因他们的创造性努力而获得版税。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电影可以被复制，出售给世界各地的人，而表演者将得不到一分钱。由于色情业不能受到版权法的保护，所以它可能更接近真正的“自由市场”。

第3章 百万富翁和1929年的崩溃 037

在1911年的一个夜晚，两大利益集团的代表与塔夫脱总统在白宫会

面，阻止了国家银行法的执行，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助长了全国主要的银行参与证券业的赌博的狂热情绪，为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埋下了祸根。在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富豪们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工会的力量，降低了工人的收入，导致大众购买力的下降。由于受到消费需求的限制，公司不再将其巨额利润转向投资，以扩大自己的工厂，而是将越来越多的富余资金投向了华尔街，将投机性泡沫吹得巨大无比。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致使整个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第4章 亿万富翁和2008年的崩溃 055

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地位的骤降，使美国成为一个由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更加平等的国家。政府不再是代表一小部分富裕阶层利益的工具，而是成为一个代表整体人口利益的机构。新的时代为华尔街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总是有人想要废除战后的新政措施。华尔街的野心随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而再度复苏。在实体经济中，公司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使其将资本再次投向了金融部门。精英利用其影响力再次有效地禁止了国家对金融市场中投机活动的监管。金融泡沫的破裂第二次引致了2008年的经济崩溃。

第5章 为什么比尔·盖茨不应该拥有如此多的财富 073

人们通常认为比尔·盖茨应该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他拥有很高的天赋，工作也很努力，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慷慨的援助。他积累起的财富看起来完全是合理的，但是个人电脑并不是完全从天才人物的大脑中萌发的。发明和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成果。如果知识继承是今天所有财富的最主要来源，那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因其做出的贡献而得到应有的回报。为了确保社会应该获得的回报，我们应该对高收入者征税，而不是让富人不公平地获得社会勤勉的成果。

第6章 为什么其他亿万富翁更不值得拥有如此多的财富 091

亿万富翁通常被认为是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得巨额财富的，所以说他们也对社会无所亏欠。事实上，他们的行动有时完全就是赌博，几乎对社会毫无贡献，甚至会直接危害公众利益。保尔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帮助触发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让世界各地数千万计的人蒙受苦难。因此，像他这样的富翁更不值得拥有如此多的财富。

第7章 汉克·阿伦与激励的神话 107

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评论家认为：任何降低社会上最有才华的成员的经济报酬的措施——比如高税收——都会妨碍他们发挥全部的能力，从而阻碍整体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战后初期，税率最高时期的经济增长强劲。经济行为受到追逐个人能力感、自尊和自我一致性的激励和引导。因此，对极富人群减薪并不会扼杀他们的工作欲望，最有才华的人的动机是远比金钱因素更复杂。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人们获得多高的收入，而是人们相对他人获得多高的收入。正是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这使他们在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激励他们表现出高超的水平。

第8章 将乐趣带离避税天堂 127

在20世纪90年代，避税活动开始推广开来，到2003年，美国企业经理人在税收庇护所隐藏了近10亿美元的应纳税所得额。富人的避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然而，当富人因将收入藏匿于国外而犯法时，政府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更温和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源于富人发出的一种威胁：如果不将税收保持在较低水平，他们将彻底离开美国。实际上，富人并不能那么容易地将资金打包并离开。如果他们成功地放弃了自己的公民身份，仍然还要缴纳出境税，这一税种的税收金额是巨大的，而且它们正在执行之中。

第9章 为什么亿万富翁对于你的健康有害 143

随着亿万富翁的崛起，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人们遭受健康问题、社会功能失调的风险越高。研究显示，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医疗或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你拥有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以及在社区中得到的认可程度。感到羞辱或与别人的收入相比更低、缺乏控制或难以自主对于触发不健康的压力至关重要。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巨富们利用政治影响力，让政治家们保持低税率，导致公共服务恶化，加剧社会分化和社会的压力水平。其他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尤其是焦虑和抑郁，其比率急剧上升。

第10章 为什么亿万富翁对民主有害 161

富人们趾高气扬地主导着社会，精英们挫败了尝试加税的企图。截至2011年秋季，这些巨富们撤销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的福祉至关重要的法案。富豪统治的崛起与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都提醒我们：在一个社会中，如果金钱分布得更平均，那么普通公民就可以更大声地说话，这样，有意义的民主就成为可能。极端不平等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富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健康和社会福祉，而且最终关闭了民主之门。

第11章 公民身份的真正徽章 191

斯密认为：每一项税收，对于纳税的人来说是一枚徽章，这不是奴隶的徽章，而是自由的徽章。事实上，我们不能把税收看作对自由的剥夺，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民主的真正基础。税收来自于我们的民主系统做出的决策，决策过程我们都有机会参与。通过民主程序，我们决定集体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商品和服务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公开市场上对它们进行单独支付的话，它们会花费更多，而且更难提供。

第 12 章 对卵巢彩票的修补 207

决定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是它的出生环境，沃伦·巴菲特将之称为“卵巢彩票”。幸运地抽中卵巢彩票的人将获得巨额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即使无所作为，也能兴旺发达。但是，这似乎很不符合大多数美国人所持的道德原则和公正理念。因此，税收制度被设计出来以确保利益得到更广泛地分配。也就是进行直接的财富转移，将巨富家族的财富转移给他人。比如，恢复对富人的高税收，阻止所有的人向国外逃税，重建累进税制度，从更累进的继承税中获得额外的资金，为美国儿童建立教育信托基金等。

注释 235

第 1 章 重返财阀统治

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式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由几十个“强盗大亨”主宰的社会。随着 1929 年华尔街的崩溃及其后痛苦的经济衰退，美国的富豪统治走入低谷。在战后干预的年代（1950—1980 年期间），通过对富豪征收高额税收的方式，美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的收入分配，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广大的国民分享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然而好景不长，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阀统治的复兴使美国恢复到由富豪统治的国家，人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乃至零增长时期，工会力量凋敝，不平等问题严重。直到在 2011 年的秋天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才又大胆地把民主以及平等的主题重新推回到聚光灯下。

想象一下：每秒钟给你一美元。

以这样的速度，一分钟后，你将拥有 60 美元。

12 天之后，你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这是在人们最狂野的梦中也不会被梦到的事。

但要多久才能成为亿万富翁？

嗯，以那样的速度，几乎要 32 年。

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不只是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梦想，这可能也超出他们的理解。

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亿万富翁的财富规模：想象比尔·盖茨——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世界首富——数他的 530 亿美元要花多少时间。如果他不分昼夜不停地数——每秒钟数 1 美元——他数完要花 1680 年。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如果比尔·盖茨开始数他的财产，这一年是公元 330 年——在那一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其妻子活活煮死，并选择了拜占庭作为帝国的新首都——到现在他才刚刚数完。

在成为大众吹捧的中心、享受多年这样的乐趣之后，到 2011 年的秋天，超级富豪们经历了新奇的且让他们震惊的事情：刺眼的聚光灯将灯光直接对准了他们。

他们想要厉声说出类似这样的话——把光线调暗点，否则……这是很自然的，但也许是不明智的。毕竟，那些将聚光灯照向他们的人不是他们的员工，这些人蜂拥穿过曼哈顿下城的街道，像暴民一般，人们可以在那些并未普及自由信念的遥远地区发现这样的暴民。

突然，就在这里，在美国，成为令人惊叹的、奢侈的、享乐的富豪，不再是一个荣誉象征；而曾经，他们坐在兰博基尼里，压扁了轮胎挤开挡道的行人，兴高采烈地向世界宣布这一荣誉象征。华尔街——野心、头脑、贪婪、魅力和“美国梦”中非常敏感部位的联结——不再是值得荣耀的地方，而是被占领的地方。

它会在哪里结束？显摆自己的财富反而会成为他们的尴尬吗？游艇变得像裘皮大衣一样——生活中的这样一点小乐趣也会被毁掉，因为穿着它（或停靠码头）可能会引来一大群示威者，这样的日子会出现吗？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小心眼的抗议者，他不愿意看到一位银行家懒散地躺在宽阔的游艇上，游艇比他曾经拥有的房子大得多，不过现在游艇属于……一家银行。

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幸运的是，对银行家来说，占领者不大清楚他们的目标，他们打击的是较广泛的1%，他们显然不知道，真正的红肉位于食物链的更高端。顶端的0.01%，顶端的0.001%，或者直到令人目眩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么说是合适的）亿万富翁占领的高度。

无论如何，援助已经开始了。目前，游说产业已经迅速展开了行动。到2011年11月下旬，主要的华盛顿游说公司之一——克兰福德（Clark, Lytle, Geduldig & Cranford）公司——为美国银行家协会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被一些卑鄙人物泄露给了新闻界），该备忘录展示了一个媒体战略，旨在打击占领华尔街的强大力量。

说客们坚持认为，成功的答案在于精心准备的、旨在揭发占领者的不良动机的反击活动：“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们与政治对手一样具有见利忘义的动机，那么这会严重破坏他们的信誉。”¹（很难想象见利忘义的动机会使人们在浸水的帐篷中连续待上数周）

真正的危险是反对华尔街运动所传达的信息，如果它不受质疑，那么就可能把华尔街的大银行变成民主政治的炮灰——甚至更糟。备忘录中提到：“更应该关心的是，共和党人将不再保卫华尔街的公司——而是可能开始反对它们。”

游说者甚至对茶党民众提出这样的愿景，希望他们加入某种左右翼平

民主义的攻击银行行动：“在今年晚些时候，媒体报道了下一轮的分红，并将其与数百万美国人凑合过假期的故事进行对比，这种组合消息可能具有潜在的爆炸性。”（令人欣慰的是，甚至当他们密谋破坏民主运动时，游说者现在对“假期”也使用包容性的语言）

这些隐隐出现的伤害无疑令金融精英们感到迷惑不已，这些人至今还很难理解，他们应该从某种程度上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负有责任。

早在2009年1月，金融崩溃后才几个月，当精英聚集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时，困惑就已经很明显。银行家、商界领袖、政府高官和其他思想界的大腕每年聚集在达沃斯，庆祝自由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政府规模的缩减，以及资本主义的复兴。当然，有些困惑在该年达沃斯的论坛上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市场在管理自己这件事上为什么做得如此之差。《页岩》（*Slate*）杂志上一篇报道的标题把人们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达沃斯人很困惑。”记者丹尼尔·格罗斯如此写道。他在小短文中解释说，尽管存在困惑，人们在达沃斯还是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成功是伟大的男人和女人的成果，而失败则归咎于体制。”或者，如同另一个记者朱利安·格罗夫在英国的《卫报》所指出的：“冲击是真实的，悲伤几乎尚未开始，但在达沃斯，看似没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该那么重要或者那么富有。”²

这些经济巨头本来应该转变心态，不过他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毕竟，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秩序背后的一个关键概念一直是，个人才能具有中心的作用——需要用丰厚的金融回报来培育这一才能。该思维方式认为，唯有如此我们中的杰出人物才会被吸引到支配世界的高层工作中。确保这些巨头的积极参与被明确认为价值巨大，据此要通过顶层设计对他们报酬的数额进行调整。不能只是因为目前全球经济已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就痛打那些设计了这种机制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曼哈顿，当时任美林首席执行官的约翰·塞恩解释他为什么会觉得有必要为高管支付40亿美元的奖金，使“最优秀”的人受雇时——恰好是这些一味追求成功的人使得公司净亏损270亿美元，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他显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可讽刺

的。2009年，华尔街的群体决定为他们自己总共支付创纪录的140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他们在2007年的纪录——在那种情况下似乎显得奇怪，但那时甚至没有人指责华尔街银行家过分谦虚，不够招摇，或倾向于自我怀疑。

走出空气稀薄的达沃斯和曼哈顿，怀疑开始出现了。一些没那么聪明的人现在嚷嚷着要求改变现状，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削减高管的薪酬，可能会使超级天才在像教学或保健这样的领域中更多地寻求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岗位。但一封致《纽约时报》的信件澄清了这种方法的危险性，为维持奢侈的薪酬，甚至巨额奖金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巨额回报，华尔街商人都会去找其他工作。我们真的希望这些贪婪、不称职的小丑为我们建造房屋、教育我们的孩子，或开着我们的出租车吗？”³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在顶端人群中的集中度急剧上升，其结果是，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其不平等的社会。

在走的更远之前，我们要指出，我们并不是反对任何的不平等。反之，某种合理的不平等不仅是接受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取的；因为它允许针对个人努力和贡献的不同水平支付不同的回报。但今天存在于美国的——英国和加拿大的程度较低——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要极端得多。事实上，美国目前的不平等程度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柬埔寨，和尼日利亚，甚至许多中东国家——如埃及和突尼斯，还要极端得多；在这些国家，过度的不平等被认为引发了2009年—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的暴动。⁴

在过去的三年里，美国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几乎所有的成果都分配给了顶端的10%的人群，而收益中特别大的比例到了1%人群的手中，而令人吃惊的比例则到了顶端0.01%的人手中。在1980年和2008年之间，位于底部的90%的人口的收入增长了不到1%，平均增加额只有303美元。而与此同时，在同样的年份，位于顶端的0.01%的美国人收入增长了403%，平均增长额高达2190万美元。最富有的30万美国人如今享受的收入几乎与底端的1.5亿美国人的一样多。⁵这些超级富豪组成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

阶层，可以用财阀阶层很好地描述这个阶层——他们与早在20世纪20年代统治美国的、代表金融利益的财阀极其类似，那时候有钱人的阔绰与其对政治过程不相称的影响显得特别露骨。

美国回归财阀统治格外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的极端不平等时代和目前的极端不平等时代之间，发生了一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干预的年代——特别是战后初期，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就像许多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美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和平均的收入分配，这在西方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是很少见的。当然，比较普通的美国人在近几十年里的命运和他们在二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的命运，会让人感到很震惊。在上一段中提到，收入处于底层的90%的美国人在过去的三年里的收入只增长了1%。但是，在1950—1980年期间，底层的90%的人的收入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增长了75%，平均增加值为13222美元。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质和美国人的生活。然而，即使发生了这一显著的变化，不平等的问题和它的负面影响也基本从公共讨论中消失了；直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的秋天大胆地把这一主题推回到聚光灯下。

在世界的1011位身价超过十亿的富豪中，我们从约翰·保尔森说起似乎比较合适。他下赌次级抵押市场会崩溃，因此狠狠赚了一笔。

温文尔雅，身着黑色外套，面带一个神秘的微笑（让人可能会想起蒙娜丽莎的微笑）——他无疑是地球上罕见的几个有较高净值的物体之一——保尔森显得很平常。这本身就很奇怪，因为，作为世界上排名第四十五位的富人，拥有120亿美元的财富，保尔森（与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没有关系）从任何角度来讲当然都绝非平庸之辈。除了能显示出他是中年男子、已婚且有两个孩子、静悄悄地处理着他的事务之外，我们并不能从这位五十四岁的对冲基金经理的外表中了解更多。虽然他在精英界活动，并拥有所有的象征财富的东西，但他并不会让司机等候，人们知道他出行时乘坐出租车甚至公共运输工具。他看起来也没有受到某种综合症的困扰，记者麦特·泰比指出这种综合症导致一些华尔街的豪赌之人“开始在照镜子时看到布拉德·皮特”⁷。约翰·保尔森可能不用费力去照镜子。

当他花时间思考哪个在抵押债务凭证里的有缺陷的次级抵押贷款（CDO）将最有可能产生一个不合理的回报率、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利润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将这些时间花在照镜子上呢？

要挣大钱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保尔森；虽然他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中长大，但他们的家庭中的父母双方都有资金管理的背景。在塑造保尔森的思维方式上，他的外祖父亚瑟·伯克兰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他是一位成功的华尔街银行家，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他也设法将他的家人安置在气派非凡的公寓大厦中，该建筑现在还屹立在华尔街93号，中央公园以西处。

保尔森早就知道，他要挣一大笔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作了有条不紊的安排。他着手为自己打下基础，使自己足以申请进入纽约大学，他以金融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中赢得最佳毕业生的荣誉。在那里，如沿着斜坡向下的水一般，他很快被吸引到华尔街的赚钱宫殿中，他在1994年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以尽可能地利用他非比寻常的天赋，发现最大的赚钱机会。最终，在2005年4月，他预感到超热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正在向惊人的崩溃迈进。他隐瞒了自己独特的洞察力不让别人知道，他对他的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采取放任的态度，想办法如何通过期待那些签署抵押贷款的数百万人——这些人事实上只能在梦想中才能供得起抵押贷款——将很快开始违约而获利。当他们违约的时候，保尔森在那里看着钱如潮涌一般进入他的对冲基金。他一个人在2007年就挣了37亿美元，这肯定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的通过金融获利的空前纪录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对冲基金行业收入的短暂下降。随着华尔街的崩溃使世界经济在2008年陷入到残酷的经济衰退之中，对冲基金经理的薪酬也下降了约50%。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大幅降低，排名最靠前的25位经理的平均收入仍有4.64亿美元。而且，到2009年，当全球经济依然深深地陷在衰退的泥潭中时，对冲基金行业已经完全反弹，其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甚至超过了史上最高的2007年的水平，此时光是保尔森一人，就获得了37亿美元。现在对冲基金经理的头把交椅被大卫·特普尔

(David Tepper) 抢占，他获得了40亿美元，其收入基本上是来源于对美国政府会救助大银行的期待之中（保尔森排名第四，收入为23亿美元）。总的来看，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赚了253亿美元，平均每人赚到的比10亿美元稍多，比上年同期的4.64亿美元平均增长一倍以上。到2010年，当美国还在为失业率揪心不已时，排名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将数额为22亿美元的收入带回了家。保尔森重回巅峰，突破了自己的纪录，获得了49亿美元的年收入。

为了把所有这一切都加以考虑（或者尽可能地将这些加以考虑），让我们将今天顶层人士的收入与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收入进行比较；洛克菲勒在他的时代和他之后的几十年中，都是人们能够想到的最富有的传奇人物。1894年，在镀金时代的最高点，洛克菲勒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5万美元的高收入（用今天的美元计算，合3000万美元），这是当时美国平均收入的7000倍。2010年，保尔森赚到的49亿美元的收入则超过了美国平均收入的10万倍。

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保尔森，这位引发全球经济崩溃的人，在2010年获得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十万名护士的收入总和，而这十万名护士为超过800万美国人提供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幸运的是，我们有现代经济学的教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距。否则，我们可能会难以理解，为什么保尔森可能与高达十万名护士的总价值相当，或者，就此而言，仅与一个护士的价值相当。

保尔森和特普尔的例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今收入顶尖人士的富裕程度，也展现了他们超过过去收入最高人士的程度。实际上，保尔森和特普尔是精英集团的成员，金融史学家查尔斯·盖斯特（Charles Geisst）称这些人为“所有时代收入最高的人”。⁸ 这些数字表明的，不只是富人越来越富，而且还表明，富人们还大幅地领先于其他社会成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美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很少或根本不增长，中产阶级家庭现在一般需要两个人同时工作，才能赶上他们的父母时代一个人工作就能达到的物质水平。因此，为了保持相同的生活水平，他们需要工作得更努力。收入增长几乎完全发生在顶层，而且，一个人在社会收入中处的地位越高，